时代先锋

长空亮剑 云海争锋

——记两届“金头盔”获得者、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蒋佳冀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姜天骄

图① 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蒋佳冀。
图② 蒋佳冀(中)和他的战友们。
图③ 蒋佳冀带团队在雪域高原开展突防突击训练。 刘应华摄

人物小传

蒋佳冀,33岁,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他连续3年执行高原驻训任务,探索高原训练模式,攻克高原夜航、高原越冬驻训、高原陆空联合演习等险难课题;他创造性提出“新员改装飞行五步训练法”,带出一批优秀飞行员。作为战斗机飞行员,他是空军目前36名“金头盔”获得者中连续两届“问鼎”第一个人,出色完成10余项“破限”飞行任务。

2014年仲夏,一群年轻的中国空军官兵,昂首向天,傲然肃立:“今若开战,不胜不归!”铿锵誓言,直冲云霄。这是空军航空兵某团33岁的团长蒋佳冀和他年轻的战友们,用这种方式祭奠120年前的甲午国殇。要问他敢打必胜的勇气从哪里来?来自他挑战极限、巅峰对决的凛凛寒光,来自他追逐梦想、渴望亮剑的铁血豪情。

“就为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冲上去一剑封喉!”

航空兵某师政委廖应宾清楚记得8年前他与蒋佳冀的那次对话。

当时,已是二代机团队飞行骨干的蒋佳冀放弃提升机会,宁肯从“新兵蛋子”起步,主动要求调到当时廖应宾任团政委的三代机飞行团,毅然改飞新型战机。

“你为什么要飞新战机?”

“我想用它打仗!”

自从成为歼击机飞行员,打仗、打胜仗,就成为蒋佳冀追逐的梦想。能驾驭最先进的战机,无疑会成为舍我其谁的打仗先锋。

2009年8月,在同批战友中第一个完成改装任务的蒋佳冀,驾驭新型战机参加了空军“体系对抗”演练。在陌生环境、陌生气象、陌生战场,他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那感觉相当不错。然而,战后复盘,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及对手。这一结果令他警醒:再先进的战机如果只当作单一武器平台,那只是停留在机械化时代。打赢信息化战争,必须从“头脑革命”开始。

信息化、电子战研究持续深化,新型战机极限性能不断开发,10余套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战法战术相继出炉。天道酬勤,检验“头脑革命”成果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2011年8月,时任飞行大队长的蒋佳冀奉命再次参加空军体系对抗演练,带领团队执行突防突击任务。地空导弹、预警机、电子干扰机和雷达网,在茫茫戈壁编织起空、地、电、磁多维立体防御网,似乎“连只苍蝇也休想飞过去”。蒋佳冀和战友熟练运用精雕细琢的多套战法,沿着山谷超低空飞行,巧妙实施电磁干扰,长途奔袭千余公里,出其不意突进“敌方”防线后方,成功摧毁重要目标。还没等对手缓过神来,他们已扬长而去。

那个“耀武扬威”的瞬间,蒋佳冀聊得十分惬意:返航途中,看到戈壁滩上“敌方”人员正手忙脚乱操控装备,我调转机头,几乎擦着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似乎听到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喊:“玩儿命啊!”这种超低空飞行的技能,是蒋佳冀和战友们在巴山蜀水的云雾中练成的。

同年金秋,中国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检验性考核”拉开战幕。“说白了,就是自由空战,在天上放开打。”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沙场百战”中遴选出的百余名精英捉对厮杀,巅峰对决,争夺10顶象征职业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在这群空中骄子中,蒋佳冀是少数几名“80后”之一,第一仗遭遇的对手,就是装备性能和对抗经验都优于自己的飞行员。

蒋佳冀跨进座舱,多种作战预想已深深刻于脑海。从高空缠斗到中空,他大速度、大幅度急转抢先,载荷超过7个G,电磁干扰、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攻击……以全新的战术大比分战胜对手,成为最年轻的“金头盔”获得者。

在常人眼中无异于“刀尖上跳舞”的职业,蒋佳冀干得很享受。他说,“就为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冲上去一剑封喉!”

血性和胆气是人民空军代代传承的精神血脉

熠熠生辉的“金头盔”,无疑是空中猎手王者之冠。然而,“在决胜千里的信息化战场环境中,近乎冷兵器时代的空中格斗,还有实战意义吗?”记者心生疑惑。

“当然有!”蒋佳冀所在的航空兵某师师长说,当空战双方依托的信息化体系平台遭到相互压制,空中格斗近战歼敌仍将是最终方式。因此,歼击机飞行员要想笑傲长空,必须练就克敌制胜的必杀技,磨砺出有我无敌的精气神。

常言说,“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说的就是闻不到鏖战沙场的血腥,就缺了刺刀见红的血性。曾有人问蒋佳冀,“生长在盛世欢歌中的年轻飞行员,还有战争年代老一辈飞行员‘空中拼刺刀’的那股血性吗?”

蒋佳冀的回答十分冷峻:“升空就是作战,作战就到极限,这是空军飞行员的本色。血性和胆气是人民空军60多年代代传承的精神血脉,搏击长空的钢铁军阵里从来不缺乏敢打必胜的勇士。”已经有15年“飞龄”的蒋佳冀坚信,尽管武器装备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人始终是武器的主宰和灵魂,“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争铁律依然没有改变。在未来空战中,不仅要继续“拼刺刀”,而且将会“拼”得更凶、更狠。为此,必须敢于“刀尖上舔血”!

“昨天的绝招,可能是今天的绝路。没有永远的战法,只有永远的变化。”2012年,蒋佳冀参加空军第二次“自由空战”对抗比武,凭借独创的新战法,再次摘得“金头盔”。

近年来,空军加速实施“打仗一样”的实战化训练改革,为蒋佳冀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与战友们研练了10余套行之有效的战法,先后被四总部评为“全军优秀基层干部”和“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就是在一次次‘破限’飞行中,让我真正领悟到空军飞行员全疆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的深刻内涵和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使命担当。”蒋佳冀说。

作为战斗机飞行员,蒋佳冀是空军目前36名“金头盔”获得者中连续两届“问顶”第一个人,出色完成10余项“破限”飞行任务,被空军授予“矢志打赢的模范飞行员”荣誉称号。从担任大队长到团长,他和战友们践行的电子对抗战理念,引发一股电子战研究热潮;他创造的“新员改装飞行五步训练法”,带出了一批优秀的“空中猎手”;他连续3年执行高原驻训任务,探索高原训练模式,攻克高原夜航、高原越冬驻训、高原陆空联合演习等险难课题;他探索建立指挥机关精细化管理模式,使之成为“领飞雄鹰”。

“以前升空作战,想的只是击落对手。今后,我要在胸中描绘出一张体系对抗制胜图。”在打赢未来信息化空战道路上,以蒋佳冀为代表的中国空军新生代蓝天战鹰,任重道远。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的印记

周总理“逼”出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

——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讲述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故事

本报记者 于 勇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焱

今年1月8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逝世39周年的日子。《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首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已经85岁高龄的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了新中国环保事业在周总理支持和推动下艰难起步的故事。

谁是污染大户,就由谁来管环保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题,并提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但是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来抓这方面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曲格平从燃化部(石油部与化工部合并而成)调至“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

当时,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周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

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赞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曲格平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做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艰辛探索。

两次会议让国人意识到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是与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这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要让中国人走出国门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镜鉴,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

当时,一般的认识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是个卫生问题,所以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为主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国务院后,周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代表团回来要制订一些环境保护措施,需要综合部门来派团。”后来,代表团根据总理的意见调整了组成名单,加强了领导力量。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周总理也都一一过目。他提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等环境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就这样,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代表团回国后,在向周总理做汇报时,重点提出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西方国家之上。总理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中国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中,但是周总理坚定地排除干扰,毅然决定于1973年8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总理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各省区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入,越开越热烈,最终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由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推向了社会。曲格平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宣传大张旗鼓,大会堂门口出现了来参会的车队,天安门广场上还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来拍摄。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唤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气候下,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和奇迹。在曲格平看来,这离不开周总理的支持和倡导,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政治胆略。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地方也仿照国务院的做法,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加强宣传,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冲击波。

周总理曾担心“雾伦敦”后出现“雾北京”

其实,周总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远不止在上述两次会议期间,他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大家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就对他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状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让这位记者来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并且要求:除了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和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要来听这个课。报告会结束后,总理还专门打电话询问听课效果,并对分组讨论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把这个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

据曲格平统计,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1970年到1974年的5年间,周总理对环境保护至少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环境保护有这么多的讲话,足可以看出总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当时,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突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都很严重。所以,周总理讲话中提及上海的例子比较多。他对上海的同志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总理对北京的环境状况也特别关心。上世纪70年代初,他说:“首都烟雾弥漫,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过去人们常说‘雾伦敦’,我们弄不好,就成‘雾北京’了。”他认为,北京是首都,工业企业不要建太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厂不要建在首都。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清洁的首都。他说:“工业建设要耗费大量的水,现在北京供水都发生困难,大量污水又把清洁水源污染了,别弄得没水吃了。”

在环境治理当中,周总理提倡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当时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宣称其污水处理的水平非常高,能够养鱼。因此总理曾经陪着一些外宾去参观这个污水处理厂,看到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外宾连连称赞。后来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其实是换上了自来水,并非处理过的污水。在一次会议上,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他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骗人?很要不得。”总理还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过污水养鱼的外宾作检讨,坦陈我们的污水处理并没有过关。批评的时候,曲格平正好在现场,他向北京市传达了总理的意见。北京市立即传达到了那个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而且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以后,这个厂在污水处理上一直做得很不错。

2015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39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谈起新中国环保事业艰难起步的这段历史,曲格平老人总是很兴奋。他认为,这些事反映出周总理以其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和敏锐,预见到了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环境难题。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曲格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也许还要推后很多年。

更多中国故事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

本版编辑 闫 静 徐 达
美 编 高 妍
邮 箱 jjrbzggs@163.co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24.75元 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8166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50 印完时间:3:50 本报印刷厂印刷